

---

# 政治轉變中的選舉詮釋和制度修正： 2004香港立法會選舉「後選戰」個案研究

李立峯

---

## 摘要

西方的批判傳播研究經常指出，由於傳媒身處社會的政經系統中，再加上新聞製作過程對建制的依賴，以及文化霸權的影響，傳媒對社會及政治議題的報道會傾向將建制內的觀點以及建制本身合法化。當建制受到挑戰時，傳媒則會對建制作出「修正」，即一方面作出一定的批評，但始終維護建制的基礎和合理性。不過，對香港這樣正經歷政治轉變的社會而言，所謂「建制」本來就在不斷的變遷之中。它在公民眼中的認受性不一定高。在這種環境中，傳媒和建制會有什麼樣的關係？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一名長期以來以參加反建制社會運動而著名的社會活躍分子勝出，為探討香港傳媒對建制的態度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個案。究竟香港傳媒怎樣報道他的勝利？輿論怎樣詮釋這選舉結果的意義？如果這選舉結果可以被視為一種對香港現存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挑戰的話，傳媒論述怎樣建構這批判和挑戰的內容？透過重構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後選戰」，本文展示選舉後在傳媒出現的民意建構和制度修正現象。本文並討論這制度修正出現的原因，以及政治轉變中香港傳媒和公共論述的作用。

關鍵詞：選舉詮釋、制度修正、傳媒論述、民意、後選戰

---

李立峯為美國史丹福大學傳播學博士，現任教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學系，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政治傳播和新聞學。其著作見多本國際學術期刊，包括 *IJPOR*、*JMCQ*、*Discourse & Society*、*Media, Culture & Society*、*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New Media & Society* 等等。電郵：lfflee@cityu.edu.hk

## **Election Interpretations, Post-election Campaign, and Institutional Repair: The Case of the 2004 Legislature Council Elections in Hong Kong**

LEE Lap Fung Francis

---

### **Abstract**

Critical media studies have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media as subservient to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of a society.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medi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and/or the working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 media tend to privilege the viewpoints and reinfor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Bu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in a society experiencing political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issu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post-election discursive contests. The victory of veteran activist Leung Kwok Hung (nicknamed Long Hair by the media) in the 2004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Hong Kong was widely regarded as presenting a challenge to the establishment. How did the media report the election result? How did public discourse interpret 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his victory? If Leung’s victory represented a challenge to the establishment, how did public discourse articulate the contents of such a challenge?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post-election campaign” of the 2004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to illustrate the phenomena of public opinion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pair. These phenomena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n how we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public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uring Hong Kong’s political transition.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pair, election interpretations, post-election campaign, media discourse, public opinion

## 引言

西方民主社會講求將民意制度化於政治系統及政策制定過程中，而民主選舉則是「民意制度化」最重要的手段。不過，作為溝通民意的一種方法，選舉難免有其局限。在很多選舉中，公民在投票時只可以將他們對各社會及政治議題的意見簡化為對某一位候選人的支持。選舉不會記錄選民支持個別候選人的原因，而所有選票則被簡單地加起來以得出整體結果。整個過程讓公民清楚地得知誰勝誰負，但選舉結果的意義卻往往是含糊不清的。為什麼某一候選人會勝出？為什麼某一政黨表現不濟？勝負的差距代表著什麼？選舉結果本身並沒有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

由於選舉結果意義往往含糊不清，對選舉結果的不同詮釋經常成為選舉過後傳媒報道和公共論述的焦點所在。對政客來說，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詮釋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行為。美國政治學者Kelley (1983) 便將這個過程稱為「後選戰」(post-election campaign)。他指出，任何選舉結果都可以有多種可能的詮釋。而選舉所顯示的「民意」是什麼就取決於到底哪一些詮釋能夠在「後選戰」中取得主導地位。Kelley的論點建基於建構主義對民意的理解 (Bennett, 1994; Edelman, 1977, 1988)：在社會上流傳的「民意」基本上是媒介的再現 (mediated representation) 和論述競賽的產物。西方學者便曾對傳媒怎樣報道及分析選舉結果作過不少實證研究 (Hale, 1993; Hershey, 1992; Mendelsohn, 1998)。

但除了一般候選人之間的勝負外，選舉結果也可以引發人們對現存政治制度的疑問，例如不斷下降的投票率可能令人對「民主」這觀念本身產生懷疑。另外，如果有被視為在建制外 (甚至是反建制) 的人士參選並且勝出，選舉結果也可能被視為對現存政治文化及制度的一種挑戰。

本文的個案研究屬後一種情況。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共產生了60名議員，但一位長期以來以參加反建制社會運動而著名的社會活躍分子勝出，令傳媒在選舉後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究竟傳媒怎樣報道他的勝利？輿論怎樣詮釋這選舉結果背後的意義？如果這選舉結果可以被視為一種對香港現存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挑戰的話，那麼傳媒論述怎樣建構這批判和挑戰的內容？

從理論上而言，本文以後選戰這概念為切入點，透過個案分析，嘗試探討在政治轉變過程中傳媒和建制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之間的關係。西方的批判傳播研究經常指出，由於傳媒身處社會的政經系統中，再加上新聞製作過程對建制的依賴，以及文化霸權的影響，傳媒對社會及政治議題的報道會傾向將建制內的觀點以及建制本身合法化 (Fishman, 1980; Gitlin, 1980; Hall et al., 1978; Tuchman, 1978)。當建制受到挑戰或出現問題時，傳媒則會對建制作出「修正」，即一方面作出一定的批評，但始終維護建制的基礎和合理性。

不過，對香港這樣正經歷政治轉變的社會而言，所謂「建制」本來就在不斷的變遷之中。它在公民眼中的認受性不一定高。在這種環境之中，傳媒和建制會出現什麼樣的關係？選舉詮釋及制度修正等現象又會有什麼樣的體現？這些問題是本文的旨趣所在。筆者在下一節將繼續討論和闡釋一些和本研究有關的主要概念。然後，筆者會提供個案研究的相關背景以及個案分析。結論部分將探討本個案研究的理論意義。

## 民意建構、選舉詮釋和制度修正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出發，民意並不是在客觀現實中存在而可以被精確地測量的東西，所以傳媒和民意的關係不在於傳媒有沒有準確地報道民意，而在於傳媒透過什麼方法構造公民和民意的圖像。King and Schudson (1995) 研究美國傳媒在八十年代對列根總統的報道，就指出記者的工作模式再加上他們和列根的近距離接觸，令傳媒製造了一個該美國前總統極受民眾愛戴的景象，但這景象和民意調查的結果其實有頗大的差距。不過，King and Schudson的論點並不是說傳媒製造了和事實相違背的假象。相反，由於新聞工作者和政客當時都接受了傳媒製造的景象，從政治效果而言，列根的受民眾歡迎程度是確實存在的。

建構主義觀點強調每一種展示或「測量」民意的的方法其實都是一種建構表象的手法。每一種手法背後都預設了一些有關民意的觀念，而被展示或「測量」出來的民意到最後都要透過語言或其他象徵符號的運用才變得具有確實的意義。以科學化的民意調查為例，採納建構主義立場的學者並不是要否定隨機抽樣或統計分析的科學根據，而是強調調查研究方

法預設了對幾個基本概念的特定的理解。例如民意調查中的所謂「意見」通常只是受訪者在幾個既定答案之間的選擇，而不是一個相對完整、詳盡和具分析性的論點 (Bourdieu, 1979)。民意調查也假定「民意」是個人「意見」的總和，因此可以透過百分比來表達 (Ginsberg, 1986; Herbst, 1993)。至於調查機構應該就什麼議題進行研究，亦不是一個可以用科學方法解決的問題。當得出調查結果時，百分比本身沒有固定的意義。和任何符號一樣，民調數字具多義性 (polysemic)，調查結果是一個開放的文本，所以人們如何詮釋和回應民調所得出的數字便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Lewis, 2001; Bauman & Herbst, 1994)。

同樣道理，選舉也是表達及溝通民意的一種特定模式，具有概念和制度上的假設。<sup>1</sup> 選舉結果也具有多義性。所以，對數字的詮釋也成為「後選戰」中的論述重點，不同人士往往希望透過提出詮釋而為自己爭取利益 (Thomas & Baas, 1996)。舉例說，一位當選者很可能將自己的勝利解釋為選民對自己某些主要政策方向的支持。如果這詮釋被廣泛接納，當選者在實際推行該些政策時便會受到較少的阻力。

換句話說，後選戰就是為選舉結果「定義」的過程。西方有關後選戰的實證研究只有十數年的歷史。Hershey (1992) 的研究顯示，在1984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美國傳媒對列根的勝出有多種不同的詮釋。但詮釋的多樣性不斷減低。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後，只剩下三種詮釋在傳媒論述中佔據主導位置。Hershey (1992) 認為決定一種詮釋會否被廣泛接納有三個主要因素，分別是詮釋跟同期發生的事件的相關性、詮釋跟媒介價值觀的一致性，以及詮釋倡議者的可信性。

其後的研究多採取大致相同的策略。研究者通常以內容分析方法找出不同詮釋在不同時期中在媒體上的顯著程度。研究所處理的問題可以是為什麼不同詮釋的顯著程度不一，為什麼一種詮釋在不同時期的顯著程度有所起跌，又或是為什麼某類型的詮釋在某些選舉中大行其道，但在另一些選舉中則不被接納 (Hale, 1993; Hershey & Holian, 2000; Mendelsohn, 1998)。

本研究的分析重點卻有所不同。本文關注的是選舉詮釋和政治制度本身的關係。在一般情況下，詮釋選舉結果的意義可以為選舉制度提供合法性。詮釋選舉結果之所以重要，除了是因為它可以影響個別詮釋者

的利益外，也是因為大部分人都相信選舉的主要作用在於讓民意被表達出來，從而指引政府的工作。所以，詮釋選舉結果就是確認某種民意，在選舉中被表達出來，它告訴選民投票行為的確對他們將來要順從的政府政策有所影響 (Hershey, 1994)。

但選舉結果的詮釋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種對建制的支持？當一些選舉結果似乎顯示著一種對建制的批判和挑戰時，傳媒又會有什麼樣的表現？過往對後選戰的研究並沒有分析過這些問題，但從批判角度出發的新聞學研究卻對這些問題有所啟示。其中最相關的就是「新聞修正」(news repair) 的概念。Bennett, Gressett, and Haltom (1985) 的經典研究展示了新聞媒介怎樣透過一個「強而有力的資訊整理及再現系統」處理一些意義模糊的事件。McCoy (2001) 的研究則展示美國主流傳媒在面對互聯網新聞的挑戰時怎樣重建傳統新聞制度的界線。這些有關新聞修正的研究 (Chan, Lee, & Pan, 2006; Reese, 1990; Soderlund, 2002) 指出主流傳媒在遇到對其合法性的挑戰時會透過論述來修正和重新強調傳統專業新聞的定義。這過程或許會導致新聞實踐有些微的改變，但整體效果仍是對主流傳媒及其新聞範式重新肯定。

推而廣之，傳媒也可能會在其他社會建制受挑戰時透過論述修正而重新肯定建制的合法性和存在價值。我們可將這過程稱為「制度修正」(institutional repair)。例如美國傳媒在水門事件中也許會對個別政黨或政客大肆批評，但到最後卻仍然強調總統制本身的合法性。幾個在西方新聞學中被廣泛接受的論點可以用來解釋制度修正的出現。首先，大部分傳媒在報道新聞時都會首先採納建制內的代表人物為主要消息來源 (Fishman, 1980; Tuchman, 1978)。這些消息來源是新聞的「主要定義者」(Hall et al., 1978)，而他們的觀點往往在傳媒論述中佔據主導地位。其次是新聞媒體和政治及經濟機關之間的緊密的關係。政府是主要的資訊提供者，商業機構和廣告商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它們都影響著新聞媒體的獨立性 (Bagdikian, 2004; Baker, 1994)。同時，一個社會中的建制通常都被視為社會上一些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的體現，而新聞報道亦傾向強調現存的價值觀念 (Ettema & Glasser, 1998; Hallin, 2000)。整體結果是傳媒會將建制及其內的觀點合法化，而傳媒上出現的多元觀點通常也只是建制內部存在的多元觀點而已 (Hallin, 1986; Lee, 2002)。單從這些論

點出發，我們可以預期後選戰中傳媒論述會傾向將「具挑戰性」的選舉結果重新詮釋、正常化或邊緣化，減低該選舉結果對建制的衝擊。

但如先前所述，西方民主社會非常穩定，而且政治制度的基本認受性——政治學家稱為「普及性支持」(diffuse support)——相當高，制度修正出現的機會自然也大。但在一個政治變遷中的社會，建制本身就有待轉變，其基本認受性不一定高。傳媒和建制之間的關係也可能很不一樣。事實上，由於和傳媒有切身關係的新聞自由理念跟民主化及其他公民自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傳媒在不少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都起著正面而重要的作用。Gunther and Mughan (2000) 在總結多個國家的經驗時甚至指出通過傳媒而進行的政治傳播往往會降低舊建制的認受性。那麼，香港作為一個在政治變遷中的社會，傳媒和建制的關係是否也有異於西方民主社會的狀況？制度修正會否存在？若存在的話，其呈現方式又有什麼特點？以下的分析將嘗試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

## 個案研究的背景

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於該年9月12日進行。選舉分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模式。在地區直選中，全香港被分成5個大選區。各候選人組成參選名單，名單人數最少一人，最多則是該選區的議席數目。選民投票給在其選區內參選的其中一張名單。議席以比例代表制分配，每一張名單能獲多少議席視乎名單的得票百分比而定。<sup>2</sup> 在新界東選區，長期以來以積極參與街頭抗爭活動而著稱的社會運動活躍分子梁國雄以一人名單參選。結果在該區43萬多張選票中，梁國雄獲得60,925票，奪得該選區7個議席中的一席。

雖然梁國雄只是全香港60名當選議員之一，但在選舉後香港傳媒卻將極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無論是新聞報道抑或是評論，梁國雄都是焦點所在。甚至美國的《紐約時報》也在社評中談及他當選的消息。在表面上，梁國雄當選之所以矚目，是因為他長久以來都對建制抱持著非常批判的態度。他是各類型遊行示威的主要參與者和組織者，並時常在這些活動中跟前線的警務人員發生衝突。在資本主義掛帥及政治意識形態貧乏的香港，他自稱信奉托羅思基的思想，視古巴革命領袖荷古華拉

為偶像。他曾經多番強調自己不承認《基本法》的合法性。在這些基礎上，傳媒亦給予他一個「激進分子」的形象。由於梁國雄留著長頭髮，傳媒稱呼他為「長毛」（在香港的普及文化中是「反叛青年」的標誌之一）。而「長毛」亦不介意自己成為一個具爭議性的人物。他曾公開承認自己有自瀆的習慣。就算在當選之後，他仍然積極參與遊行示威，身上常穿著有哲古華拉頭像的汗衫，並堅持在立法會會議廳中維持同樣的衣著。一些時事評論員便曾指出梁國雄非常懂得怎樣吸引傳媒的注意。

梁國雄的政治態度及媒介形象，令他當選立法會議員一事被很多評論視為對建制的挑戰和衝擊。著名專欄作家李怡指梁國雄當選對立法會的生態將有很大影響：「他的激烈反對派的形象鮮明，相信他一方面會遵守一點議事規則，另一方面也會尋求強烈抗辯的突破」（李怡，2004）。另一專欄作家則指「梁國雄由在野變為在朝，勢把抗議文化帶進立法會，這必促使議會程序產生戲劇化的震盪」（馬家輝，2004）。

本文並不是要評估這些評論到底有沒有成為事實。本研究的論點是「長毛」到底能對建制產生多大的挑戰和衝擊在一定程度上要視乎媒體上的公共論述怎樣詮釋他在選舉中的勝利，而透過分析傳媒對梁國雄當選的各種論述，我們可以窺見香港傳媒和政治建制的關係之一斑。本文將透過分析3份主要香港報章上出現的論述而展現這些論點。《東方日報》及《蘋果日報》是全香港銷量最高的兩份大眾化報章，而《明報》則在以中產階級及教育程度較高的讀者為對象的精英報章中銷量最高。3份報章的政治取向亦有所不同。《明報》強調客觀中立的專業理念，在處理政治新聞時較講求持平。《蘋果》則支持民主化，並不時對香港特區政府有強烈的批評。《東方》以社會新聞為主，政治新聞較少，在處理敏感政治新聞時傾向保守。<sup>3</sup> 不過，以下的分析將較著重3份報章上的論述相類似的方。

本研究涵蓋2004年7月1日至10月31日內所有在該3份報章上出現，在內文提及「梁國雄」或「長毛」的新聞報道、社評、專欄、評論文章，及讀者來信。透過電腦資料庫，共獲得《明報》文章421篇，《蘋果》文章354篇，以及《東方》文章186篇。值得注意的是選前選後梁國雄的曝光率有很大的差異。如表一所示，大部分有關梁國雄的報道和評論都是在選舉後出現的——選後提及他名字的文章數量是選前的四倍，選後在標題中提



及他名字或外號的更是選前的8倍。這情況是眾多候選人中獨有的。例如與梁國雄在同一選區參選，最後亦以6萬多票當選的田北俊，在選舉前同一時期內，3份報章共有299篇報道及評論提及他的名字或外號「田少」，這數字顯著地高於梁國雄的178篇。但到了選舉後至10月31日期間，談及田北俊的文章只有244篇，遠低於梁國雄的783篇。

無論如何，這些數字顯示，梁國雄在選舉前並不算是傳媒的論述焦點。很多文章只是提及他的名字而已。再加上本研究對後選戰的重視，以下的分析將集中在選舉後出現的文章上。研究者自己細閱所有文章，分析其中對梁國雄當選的各種詮釋，及對其人其事的各種評論。本研究從方法上而言屬文本分析，概念上則將後選戰視為一事件，所以分析重點不在於將各種詮釋分類比較，而在於重構後選戰中有關梁國雄當選的論述競賽的經過。

表一 3份報章對梁國雄的報道及評論

	明報	蘋果日報	東方日報	總數
7月1日至9月12日	91 (15)	68 (13)	19 (3)	178 (31)
9月13日至10月31日	330 (102)	286 (87)	167 (64)	783 (253)

註：括弧內為標題中出現「梁國雄」或「長毛」的文章數量。

## 對選舉勝利的建構

過往有關選舉詮釋的研究通常都將選舉中的勝負視為基本事實，而將分析集中在對勝負的各種解釋上。不過，選舉勝負其實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它可以被不同的方式描述，而民眾對選舉的看法也可以因不同的描述而有所差異。就如一位學者在其評論文章中如此寫道：

在2000年新界東的立法會選舉中，當我發現背景和我一樣的一些中產知識分子投了梁國雄(長毛)一票時，我便知道長毛當選立法會議員只是遲早的事。對於長毛今次能以6萬多票高票當選，我並不意外。(張楚勇，2004)

這一段簡短的文字包括了兩個對梁國雄的選舉勝利的建構。第一，作者指他自己沒有對選舉結果感到意外。但其實這句話背後的假設正是

有不少人對梁國雄勝出感到意外。如果社會上大部分人都預期梁國雄會勝出，說自己「並不意外」是沒有意思的。事實上，在選舉結果公佈翌日，《東方》的標題就以「爆冷」來形容梁國雄當選，有專欄文章更指可能梁也預計不到自己會勝出。值得注意的是，早至7月22日，即選舉前約個半月，民意調查已經顯示梁國雄有不俗的支持度。若單看選舉前各樣民調報道的話，「長毛」本來就有很大機會勝出。不過，民調所提供的「客觀資訊」並沒有左右媒體對梁國雄當選的論述建構。

對於梁國雄當選的另一種建構就是指選舉結果是他的一次「大勝」。上面引述的文章指梁國雄「以6萬多票高票當選」。這「高票當選」的說法亦常見於其他文章中。一些新聞報道則透過比較梁國雄和其他候選人來強調這一點。例如《明報》9月14日的報道：

雖然民主派在新界東的得票逾五成，但其實當中逾6萬票、14.14%都由「長毛」梁國雄一人獨得，集合了鄭家富、黃成智、前綫劉慧卿，加上人氣急升的基本法45條關注組成員湯家驊的「七一連線」，得票率僅39.2%，比98年的56%、45.08%都大為遜色。（《明報》，2004年9月14日）

「七一連線」是由多位民主派人士組成的參選名單，跟梁國雄同在新界東選區競逐議席。雖然該名單所得票數是梁國雄所得的接近三倍，但以上的一段文字卻強調「七一連線」名單的人數，其代表的政治團體的數目，和「七一連線」中個別人士的知名度和民望。所以，「七一連線」「僅」得約40%的選票，梁國雄卻「一人獨得」14%。這說法雖非全無道理，但它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一張名單的受支持程度應該相等於名單中個別候選人的受支持程度的總和。<sup>4</sup>

無論如何，通過論述建構和對各種資訊選擇性的使用，傳媒廣泛地將梁國雄當選描述成一次難以在事前預測的大勝。為什麼這描述會成為主流？我們至少可以提出兩個主要的解釋。第一是「長毛」的「局外人」(outsider) 身份。梁國雄向來的形象是一位反建制的社運分子，是建制內主流政治的「局外人」。而單從概念上而言，一名「局外人」能在選舉中勝出而進入建制的機會不高。這基本假設可以令人對梁國雄當選沒有任何預期，而這種預期也成為衡量梁國雄在選舉中的表現的標準。梁國雄之

所以算是「高票當選」，是因為6萬票對一名「局外人」而言算是很多。第二，香港傳媒的新聞價值觀也可以解釋傳媒對梁國雄當選的描述。透過強調梁國雄的受歡迎程度和指他當選難以預測，梁國雄當選這事件的新聞價值也相應提升。這描述也因而可以為傳媒繼續追訪梁國雄的行為提供理據，也令他的當選原因成為一個極待解答的問題。

## 誰是長毛支持者

正如其他後選戰一樣，香港傳媒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後也為梁國雄的當選提供各種解釋。很多解釋都涉及一些對「客觀事實」的描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梁國雄的支持者的特徵。例如《明報》在9月16日的一篇報道就強調梁國雄的支持者主要是年青人及中年的基層人士。各報章亦大幅報道一個大學機構進行的調查結果，其中顯示梁國雄的支持者主要來自低收入人士居住的公共屋邨。大部分報章評論都接納這些調查資料，並基於這支持者的人口特徵來分析梁國雄當選對香港社會及政治文化的意義。對新聞工作者而言，這種對梁國雄支持者的人口特徵的理解更成為新聞報道的基本框架和新聞題材的線索。一些報章就主動訪問大學生組織的領袖對梁國雄的看法。而當梁國雄受到一些學校邀請進行探訪活動時，各報章亦給予報道，並強調他如何受到學生熱烈歡迎。與此同時，不少社會組織針對青年人作出調查，研究他們對立法會選舉的看法。當調查結果顯示梁國雄大受青年人歡迎時，傳媒亦給予顯著的報道。

不過，也不是所有評論都將「長毛」的支持者鎖定在青年人和基層市民身上。一些作者就提出梁國雄的支持者也有中產知識分子的說法。一位學者則透過分析新界東內不同區域的選票分佈，指出梁國雄得到不少中產階層支持(蔡子強，2004)。這觀點則帶出另一些對梁國雄當選的詮釋，例如一位社會學者便認為梁國雄當選顯示了香港中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孔誥烽，2004)。

討論梁國雄的支持者的人口特徵並不只是一個尋找「客觀事實」的過程。梁國雄的支持者是什麼人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因為這問題對梁國雄當選的意義有極大的影響。以青年人為例，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青年人經常被描述成在富裕環境中長大的被寵壞了的一群，他們只

對流行文化有興趣，對社會事務既不關心亦不理解。事實上，選舉後有關梁國雄的新聞報道有時也展示了這種青年人形象，如9月20日《明報》一篇有關梁國雄助選團慶功宴的報道：

一班貌似少女歌星組合Cookies的長毛助選團，面對攝記舉機，竟立即掩面驚叫「唔好影呀！」，還以為遇上《勁歌金曲》的歌迷。這14名少男少女，是觀塘的地利亞書院中四、中五學生，記者和她們論政，她們支吾以對，談到潮流明星，便七嘴八舌。（《明報》，2004年9月20日）

這種對青年人的描述並不算經常出現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後的新聞中。但我們可以透過這描述來理解將梁國雄的支持者鎖定為青年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可能令人質疑梁國雄支持者的素質和政治成熟程度。這也是為什麼支持梁國雄的評論者大多強調投票給他的人中有「中產知識分子」。重點其實不在梁國雄支持者的人口特徵的準確性，而在於到底梁國雄值不值得被認真看待。一位專欄作者將這點表現得最為顯著。他將梁國雄的支持者分為四類：「青少年」、「有正義感的中產及知識分子」、「對特區政府極度不滿的人」，和「有良好政治觸覺的基層」（陳光輝，2004）。透過「有正義感」和「有良好政治觸覺」等形容語句，這作者強調梁國雄支持者的道德和政治水平。

## 抗議文化和挑戰建制

除了從支持者的特徵出發之外，由於「長毛」長期以來給人一個反建制的印象，不少詮釋都將投給他的票理解為「抗議票」。從這點出發，梁國雄當選顯示的是很多香港市民對現狀感到不滿。但市民不滿的到底是什麼？不同論者有不同說法。有的指向政府，有的加上主流政黨政客。一位學者將梁國雄比喻為莎士比亞名著《李爾王》中的小丑，「總是把各人的毛病一一指出來」，而選民支持他則是因「在立法會選舉中天天聽到的都是候選人的負面新聞」（梁美芬，2004）。更常見的是將梁國雄當選和香港「社會分化」拉上關係：由於社會上不同界別及階層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嚴重，令到連梁國雄般的「激進分子」也可以在選舉中勝出。

雖然梁國雄當選在這些論述中被認為是各種社會問題的結果，但這並不代表論者對梁國雄當選持負面的態度。相反，很多評論均認為「長毛」當選可以擴闊香港的政治光譜。一位專欄作者「恭喜特區立法會」，因為「香港政壇終於有了一個敢於公開自認是馬克思信徒的議員。這才叫做多元發展。」(馬家輝，2004)。一位社會學者則指出梁國雄勝出顯示香港政治制度急切需要改革。其他評論甚至開始分析「長毛」所代表的「顛覆政治」：

長毛代表的就有一股顛覆力量。他顛覆論政要持平客觀理性溫和的主流觀點，他顛覆游說箍票吃飯摸酒杯底枱底交易的遊戲規則，他也顛覆著民主派論資排輩人多勢眾的大佬文化。(吳志森，2004)

不過，當評論分析梁國雄代表的政治理念時，他的支持者的素質問題又一再出現：到底梁國雄的支持者是否理解他的政治觀？例如以上一段文字之前，該時事評論員便這樣評價「長毛」受歡迎的原原因：

人們可能沒暇細讀長毛選舉宣傳品鏗鏘有力的分析和主張，選民可能根本不明白長毛的馬克思主義托派觀點。人們關心長毛什麼呢？關心他是否仍穿哲古華拉入立法會，看看他會否公開當面叫〔特區首長〕董建華下台，期待他如何支援在立法會公眾席撒傳單的戰友。一句話，等著看好戲。(吳志森，2004)

由此可見，雖然主流評論認同梁的支持者對建制感到不滿，但這些評論亦認為選民並沒有對建制可以如何轉變的實質的看法。不過，就算將這點計算在內，以上所分析的媒體論述對梁國雄當選的評價整體而言仍然是正面的。媒體論述中並沒有明顯的制度修正的現象出現。相反，不少論述更像是期待著梁國雄對建制作出挑戰。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選舉過後的兩星期中，有關梁國雄當選意義的討論是在沒有實質事件或爭議發生的情況下，在較抽象的層次上進行的。而當梁國雄的「顛覆政治」在一次實質事件中顯示出來時，媒體論述亦有所轉變。

## 宣誓爭議和民意的再建構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有當選的立法會議員都要在上任時宣誓效忠《基本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本來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宣誓儀式。但由於梁國雄認為特區政府是一個不民主的政體，他強調自己不會對其效忠，所以他要求更改誓詞內容，只宣誓向中國及香港人民效忠。香港政府則指修改誓詞有違《基本法》，如果梁堅持以「自創」誓詞宣誓，他可能會失去議席。這場爭議令2004年的立法會宣誓儀式成為傳媒焦點。

宣誓爭議可以說是梁國雄當選後對現行制度及規條所作出的第一次正式挑戰。媒體紛紛議論梁國雄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些什麼。同時，對梁國雄的負面評價亦開始顯著地出現。這些負面評論在《東方日報》中尤為明顯，專欄作家有的指長毛挑起的爭議是一場「鬧劇」，批評他「不識大體」，「不學無術」，「教壞細路」，有的甚至指他的當選是香港文化「反智的證明」。這反映了《東方日報》在政治議題上一貫的反民主派立場。<sup>5</sup>但值得注意的是，縱使是傾向民主派的《蘋果日報》及強調客觀中立的《明報》也開始有不少對長毛的負面評論：

長毛梁國雄要用自創誓辭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一鬧兩個星期，好事之徒如我都不禁納悶，想講句：「夠啦，收手啦！」(羅永聰，2004)

不過，更重要是評論怎樣批評梁國雄：縱使措詞和態度的強烈程度有別，大部分評論都建基於一個「實務」和「做秀表演」的對立，而對梁國雄的批評則是他只管表演做秀。很多評論強調梁國雄不應該只懂破壞及挑戰現行制度，亦應該做事為社會帶來實在的利益。例如台灣名作家龍應台問道：

長毛當選，除了「倒董」的情緒之外，可以被解釋為香港社會成熟的表現，它寬容異類，接受多元。然而接踵而來的考驗，才是真的：「破」是手段，「立」才是目的。「長毛文化」如何從「破」到「立」？(龍應台，2004)

這段文字既承認「長毛」當選的正面意義，但亦為梁國雄設立了一個主流社會認可的標準。整體而言，一個二元對立的論述系統滲透於宣誓爭議期間的媒體論述中。這對立中一方面是務實、理性、客觀、建設，另一方則是務虛、激進、表演、破壞。當然，問題不在這些二元對立本身，而在於在香港立法會的實際環境中運用這些二元對立來評論事件會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效果。由於香港立法會不是全面直選的，而立法會內的投票規則亦對政府有利。<sup>6</sup>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有什麼「實務」可以在立法會內進行，而立法會內議員及政黨若不跟政府合作，根本就難以「務實」。從這一角度看，梁國雄所做的「秀」其實可以理解為他嘗試顯示建制內不合理的部分。但在媒體論述中，現行制度並沒有受到批評。相反，論述重新建構及強調了對「立法會議員」的角色的傳統理解，例如《明報》在9月30日的社評就指「做秀不是議員的本業，絕大部分民眾對議員的期望，是做好法例和政策的工作，敦促政府改善管治。」所以，梁國雄也必須適應新角色：

相信大多數港人都希望見到議會真能理性議事，批評政府也不是問題，但就應該不單為批評而批評，而是給政府更好的策略，政府不接受，那時就顯示反對才是有建設性，反對派也更見公信。故此，議員一上任就要董建華下台，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史文鴻，2004）

這段文字指理性議事受「大多數港人」支持。言下之意，梁國雄是逆民意行事。事實上，在宣誓爭議期間，傳媒論述透過兩個主要方法重構一種反對梁國雄的民意圖像。第一是強調梁國雄的支持者不能代表全港市民。梁國雄由「高票當選」變成「只得6萬選票」的議員，代表性不比任何其他議員高。有論者更嘗試將投票給梁國雄的選民和「一般香港市民」區分開來：

長毛為議員宣誓的事搞得鬧哄哄，事件已去到煩擾的地步，好像為搞事而搞事，其態度的驟變，更令人覺得玩嘢！再見他大鬧國慶酒會，長毛支持者當然覺得十分爽，但一般市民的感覺又如何？會否影響民主派的形象？（《明報》，2004年10月3日）

這區分將梁國雄的支持者定義為社會上的少數，而且是不值得支持的少數。一篇專欄評論更直指梁國雄的支持者「未夠資格一步登天享受雙普選」(樂鞏南，2004)。但另外一種民意建構則強調梁國雄的支持者亦不會支持他在宣誓爭議中的行為：

長毛堅持要修改誓詞內容，這可能會令他失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何苦呢？事有輕重大小，大家選他無非是希望他可以進立法會幹一番大事，如果只為了誓詞爭拗不休，豈不是辜負了投他神聖一票的選民。(李敏，2004)

這些例子再次顯示選舉結果的意義是透過論述建構出來的。梁國雄拿下6萬票是事實，但他到底有多少民意支持和有什麼樣的民意支持則是後選戰中的論述產物。而無論以上的評論對梁國雄的影響有多大，他最終決定以斷斷續續的方式按原誓詞宣誓，而在讀完誓詞時再加上「民主萬歲」和「還政於民」的口號。梁國雄在一片重新肯定傳統立法會議員角色的公共論述中正式就職。

## 制度修正和文化霸權

以上的分析嘗試重構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後的選舉詮釋過程。總而言之，在2004年選舉後，媒體論述的即時反應是將梁國雄的當選描述成一次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勝。對他當選的解釋大多從梁國雄的支持者特徵或者「抗議票」的概念出發，而梁國雄當選有多大實質意義則是論述爭奪的焦點之一。無論如何，在選舉日後大概兩個星期中，傳媒對梁國雄的報道及評論是傾向正面的。傳媒強調他的受歡迎程度，同時亦期待著他怎樣「顛覆」建制。

但這情況很快便隨宣誓爭議出現而改變。新事件的發生可以令某些問題變得更為顯著，令某些觀點變得較為相關，同時也可以令一些仍未發言的評論者加入討論。整體結果是個別報章上的言論出現不同程度的轉向。不過，正如上文所指，最重要的並不是傳媒對梁國雄的評價由正面轉為負面，重要的是傳媒論述透過什麼方法和在什麼假設之上評論該爭議。基於一套由「務實」和「做秀」串連著的二元對立，佔據主導地位的



媒體論述在批評梁國雄之餘重新肯定了對立法會議員的角色和職能的傳統理解。

這研究結果對在文章開端所提出的有關傳媒和建制的關係的問題有什麼啟示？首先，單就結果而言，我們的確可以視以上重構出來的後選戰作為一個制度修正的過程。媒體論述在評論一名反建制分子對建制的衝擊的時候，雖然對現行制度有所批評，最終卻仍然維護著建制的基礎和合理性。有媒體論述曾指出梁國雄要反對的就是虛假的理性討論，梁國雄到最後卻仍然被要求以理性客觀的態度處事。

和這制度修正緊密相關的是傳媒論述對民意的建構。梁國雄是民選議員，代表著「民意」，但梁國雄以外也有其他民選立法會議員，代表著其他「民意」。整個議員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溝通「民意」的機關。所以，到底梁國雄對議會的衝擊是否值得支持，就要視乎誰在代表著什麼樣的民意，正如分析中所示，梁國雄代表的「民意」的素質如何，成為了2004年選舉後選戰的一個重點。而在制度修正的論述中，理性不只是議會對議員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理性被詮釋為市民對議會及議員的期望。但現行制度以至社會整體是否真的具有理性討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和空間？理性討論會否只會延續現存的權力上的不平等關係？這些問題都可被視為梁國雄「反理性」的根據，只是傳媒論述並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過探討。

不過，正如本文開端部分提出，香港作為一個正經歷政治轉變的社會，建制的地位以及認受性不能和西方穩固的民主社會政體相提並論。這可以解釋香港傳媒在梁國雄當選後的即時反應。事實上，就算是政治上採取保守立場的《東方日報》，在選舉後初期都對梁國雄作出肯定。

那麼，傳媒論述為什麼會在後來轉向？對於這個問題，西方研究中所提出的答案便不一定合用。我們不能以消息來源多來自建制來解釋以上的個案分析結果，因為香港媒體論述的參與者絕大部分都是獨立於建制以外的傳媒工作者、作家，或學者，也有不少同樣地對建制不滿的香港民主派。較合理的解釋是傳媒以至主流評論都脫離不了一個社會中最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念。每一位評論員也許在個別問題上有自己的看法，有份參與公共論述的學者也許曾受過不同的理論訓練，但他們也同屬於一個詮釋社群 (interpretive community)，在對時事作出評論時也要借用同一套文化資源。正如Ferrer et al. (2002) 對德美兩國有關墮胎問題的公共

論述分析指出，一個社會上的基本文化及道德價值觀會構成一個「論述機會結構」(discourse opportunity structure)。這結構決定什麼樣的論點容易給某一個社會中的人們接受。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報章上的評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務實」、「理性」等理念，是香港社會的「論述機會結構」的反映。

事實上，任何政府都會借用傳統文化觀念來鞏固自己的合法性。當建制受到衝擊時，最能為建制提供保護的也是一些在社會中根深柢固的價值觀念。而如果一種反建制的行動要得到認同和支持，它也必須和社會上的「核心價值」連繫起來。這很可能是每一個社會中最基本的文化霸權所在。西方穩定的民主政體和在政治變遷中的社會之間的分別，大概在於基本文化價值和政治建制之間的關連在前者已經被建立起來，成為政治傳統的一部分，而在後者，政治體制和基本文化價值間的關係則較不穩定。

一個社會的「傳統」或「核心價值」不是客觀存在而又一成不變的東西。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出發，「傳統」可以是被創造出來的東西，「核心價值」則是論述的產物。如果我們將文化霸權視為一個不斷抗爭的過程，那麼這個過程的重點往往就是要定義什麼才是一個社會上共享的傳統和核心價值。

當然，在個別事件中，視乎被挑戰的是體制的哪一部分和挑戰者的實際行動是什麼，不同的理念和價值的相關性不一樣，傳媒論述亦會因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從這一點看，本個案研究中制度修正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於梁國雄所挑戰的正是香港政治體制中較為民主和開放的部分，這使梁國雄在事件中沒有使用「民主」和「民意」等理念的專利。而宣誓爭議本身所牽涉的亦的確是較為象徵性的問題，這使得梁國雄較容易受到「不務實」的批評。而更廣義來說，梁國雄的行為之所以被傳媒論述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沒有嘗試從香港社會文化出發來為自己的「顛覆政治」去建立一套「本土」的說法。穿上哲古華拉的汗衫也許可以讓他受傳媒吹捧一陣子，但哲古華拉或是托羅斯基的思想和行徑不太可能為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人所接受。

這並不是說每一位政治人物都要為自己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基礎，而是說政治人物往往要有能力在一個特定的「論述機會結構」中為自己的

行為辯護。所以，就算在一個政治變遷中的社會，縱使建制沒有很高的認受性，公共論述也不一定支持反建制的行動。在政治變遷中的社會和制度穩定的社會之間是有差異的，但這差異不在於後者的傳媒永遠支持建制，而前者的傳媒就經常的反建制。差異只是在傳媒空間和論述競賽的相對的開放程度而已。

## 參考資料及文獻

- 《明報》(2004年9月14日)。〈黃成智落敗朱耀明內疚〉，第A07版。
- 《明報》(2004年9月20日)。〈觀塘Cookies捧長毛潮衫〉，第A20版。
- 《明報》(2004年10月3日)。〈長毛比月餅更膩〉，第D05版。
- 孔誥烽(2004年9月18日)。〈反對運動的重新整合〉。《明報》，第B18版。
- 史文鴻(2004年9月25日)。〈民主派不佔道德高地〉。《蘋果日報》，第B16版。
- 李怡(2004年9月15日)。〈立會新姿〉。《蘋果日報》，第E13版。
- 李敏(2004年10月3日)。〈反對派的真功夫〉。《蘋果日報》，第E13版。
- 吳志森(2004年9月21日)。〈長毛邊緣才是你廣闊的空間〉。《明報》，第A34版。
- 馬家輝(2004年9月14日)。〈梁國雄議員〉。《明報》，第D05版。
- 馬家輝(2004年9月15日)。〈江湖蘭花〉。《明報》，第D07版。
- 梁美芬(2004年9月15日)。〈「長毛」不是中央最討厭的人〉。《東方日報》，第B16版。
- 陳光輝(2004年9月20日)。〈長毛選戰策略大解構〉。《明報》，第A31版。
- 陳韜文、李立峯(2005年11月)。〈從民意激盪中重構香港公共政治文化：七一大遊行公共論述分析〉，「文化政治：香港社會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 陳韜文、李立峯(待出版)。〈民意激盪中的傳媒趨同和修正政治平行：香港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個案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 張楚勇(2004年9月22日)。〈長毛反建制非要推翻建制〉。《明報》，第A14版。
- 蔡子強(2000)。《香港選舉制度透視》。香港：明報出版社。
- 蔡子強(2004年9月29日)。〈新界東長毛才是跨階層〉。《明報》，第B08版。
- 樂羣南(2004年10月6日)。〈長毛大鬧酒會的啟示〉。《東方日報》，第B16版。
- 羅永聰(2004年10月3日)。〈1847年的「老柴」和2004年的「長毛」〉。《明報》，第D02版。
- 龍應台(2004年9月24日)。〈栽培香港〉。《蘋果日報》，第E07版。

- Bagdikian, B. (2004).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 Baker, E. (1994). *Advertising and a democratic p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uman, S., & Herbst, S. (1994). Managing perceptions of public opinion: Candidates' and journalists' reactions to the 1992 poll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133–144.
- Bennett, W. L. (1994). Constructing publics and their opin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101–120.
- Bennett, W. L., Gressett, L. A., & Haltom, W. (1985). Repairing the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2), 50–69.
- Bourdieu, P. (1979). Public opinion does not exist. In A. Mattelart & S. Siegelau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pp. 124–13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IMMRC.
- Chan, J. M., Lee, F. L. F., & Pan, Z. D. (2006). Credibility of online news sites in the eyes of journalists: The case of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8(6), 925–947.
- Edelman, M. (1977). *Political language: Words that succeed and policies that fai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elman, M. (1988).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ttema, J., & Glasser, T. L. (1998).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errer, M. M. et al. (2002).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insberg, B. (1986). *The captive public*.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nther, R., & Mughan, A. (2000).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media: A reassessment. In R. Gunther & A. Mughan (Eds.),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402–4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e, J. F. (1993). Shap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285–302.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 Hallin, D.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2000).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 pp. 218–237). London: Arnold.
- Herbst, S. (1993). *Numbered voi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rshey, M. R. (1992). The constructed explanation: Interpreting election results in the 1984 presidential race. *Journal of Politics*, 54(4), 943–976.
- Hershey, M. R. (1994). The meaning of a mandate: Interpretations of “mandate” in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verage. *Polity*, 27(2), 225–254.

- Hershey, M. R., & Holian, D. (2000). Constructing explanations for US state governors' races: The abortion issue and the 1990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3), 239–262.
- Kelley, S. J. R., Jr. (1983). *Interpreting ele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g, E., & Schudson, M. (1995). The press and the illus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strange case of Ronald Reagan's "popularity." In T. Glasser & C. T. Salmon (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pp. 132–155). New York: Guilford.
- Lee, C. C. (2002). Established pluralism: US elite media discourse about China policy. *Journalism Studies*, 3(3), 343–357.
- Lee, F. L. F. (2006). Poll reporting and journalistic paradigm: A study of popularity poll coverage in newspaper.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2), 132–151.
- Lee, F. L. F., & Lin, A. M. Y. (2006). Newspaper editori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censorship in Hong Kong. *Discourse & Society*, 17(3), 331–358.
- Lewis, J. (2001). *Constructing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M. E. (2001). Dark alliance: News repair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1), 164–193.
- Mendelsohn, M. (1998).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oral mandates: Media coverage of election results in Canad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5(2), 239–253.
- Reese, S. D. (1990).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4), 390–409.
- Robinson, D. (1999). *The measure of democracy: Polling, market research, and public life, 1930–1945*.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oderlund, G. (2002). Covering urban vice: The New York Times, "White slave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knowledg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4), 439–460.
- Thomas, D. B., & Baas, L. R. (1996). The postelection campaign: Competing constructions of the Clinton victory in 1992. *Journal of Politics*, 58(2), 309–331.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 註釋

1. 民主選舉的概念性假設也就是民意調查的概念性假設。科學化民意調查的發展本身就與預測選舉結果息息相關。就這一點，可參考Robinson (1999)。
2. 有關香港選舉制度的更詳細的資料和討論，可參考蔡子強 (2000)。
3. 有關香港報章報道政治新聞時的取向的實證研究，可參考陳韜文、李立峯 (2005)，陳韜文、李立峯 (待出版)、Lee (2006)，以及Lee & Lin (2006)。
4. 另一個可以用來跟梁國雄比較的例子是同在新界東參選的親商界政黨自由黨

主席田北俊。後者同樣以一人名單參選，並獲6萬9千多票支持。但在傳媒論述中，以「高票當選」形容梁國雄的頻率比田北俊高。

5. 在選舉前及選舉後3份報章對梁國雄的報道的多寡及評論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均顯示了3份報章慣常的政治取向及處理政治新聞的手法。例如《東方日報》在選舉前對梁國雄就只有極少的報道。
6. 舉例說，在一般情況下，如果立法會要通過一項政府提出的議案，只要過半數議員支持就可以。但如果立法會要通過一項由議員提出的議案，則要由30名地區直選議員及30名功能組別議員分組投票，議案需在兩個組別中均獲過半支持才能通過。由於功能組別的議員較多在政治上傾向保守，所以民主派幾乎沒可能令一個對建制具挑戰性的議案在立法會中通過。